



全国人大代表李杰云： 明确地方国资系统金融企业监管模式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李杰云提出建议，尊重国有实体企业法人财产权，明确地方国资系统金融企业监管模式，落实以出资关系为基础的国有资产监管职责。

资料显示，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各级财政部门根据本级政府授权，集中统一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有关国

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暂行规定的通知，全国各地陆续出台地方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相关办法和规定。明确地方财政部门对本级国有金融资本履行出资人职责可以采取直接管理或委托管理两种方式，一些地方对本级国有金融资本建立了直接管理名录和委托管理名录。

目前，由财政部门直接监管或委托监管国有实体企业出资的金融企业情况的有北京、广西等10个省区（直辖市），以广西为例，财政部门直接管理的政

府直接出资金融企业11户，委托管理金融企业23户。（国资委监管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实体企业出资的金融企业）在监管实践中，财政部门对不具有股权关系的金融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进行直接监管或委托监管，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效率；一是造成多头重复监管；二是难以规范治理；三是不利于上市公司监管。

根据这一现状，李杰云建议重点应做好如下工作：

一是对财政部门直接监管或委托监

管国有实体企业出资的金融企业情况进行再评估。各级财政部门对国有实体企业出资形成的各个层级金融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存在诸多难以协调的问题，有必要通过政策执行评估予以界定和明确监管范围。

二是充分尊重国有实体企业法人财产权。地方国资系统所属金融企业股权，属于国有实体企业法人财产权，应由国有实体企业以产权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全面完整行使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

享有资产收益等出资人权利。

三是落实以出资关系为基础的国有资产监管职责。出资人职责和监管职责是紧密联系、互为依存的一个整体，“谁出资、谁监管、谁负责”将更加科学有效的国有资产监管模式。由国资监管机构依据出资关系对国有实体企业出资的金融企业履行国有资产监管职责，有利于实施规范统一的监管制度，促进金融企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文章来源：广西国资委）

全国人大代表邹彬：推动“农民工” 向新型建筑产业工人转型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建筑旗下中建五局总承包公司质量管理员邹彬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农民工培育成“新型建筑产业工人”迫在眉睫，要加强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培育，进一步落实企业办校的相关激励政策，同时加大就业承接相关产业链建设，进一步推进装配式新兴产业升级发展，助力打造新时代高素质、高技能劳动产业大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工匠力量。

近几年，“推动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型”的呼声很高，各地政府也在积极出台相关制度推动该项工作的转变和落实，但就现阶段而言成效并不明显；农民工群体“青黄不接”“代际断层”的问题日渐严峻，劳动力

逐年减少，高素质建筑工人依旧短缺。然而，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还在进一步加快，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完善的步伐并未减缓。

邹彬表示，农民工转型成新型产业工人，需要城乡两个方面、政企两个主体长期共同努力，按照教育所学、学有所用两个步骤精准施策，在政府主导下，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才能有效实现农民工队伍建设升级。

具体到如何加强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培育，他认为政府应当进一步落实企业办校的相关激励政策，进一步发挥国有大型央企办学的特色和优势，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抓紧落实产教融合型企业

组合式激励和企业办职业学校的生均经费拨付问题，引导职业院校积极参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

其次是发展装配式建筑产业，推进建筑工业化，把工地搬进工厂，让新一代农民工学有所用。建议由政府主导，政企合作，大力完善装配式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完善装配式建筑通用技术标准，加大装配式建筑发展政策支持力度，培育装配式产业发展环境，促进建筑工业化事业蓬勃发展，以更大、更优质的平台吸引产业工人就业，推动“农民工”快速向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转型。■

（文章来源：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全国人大代表王杜娟： 放宽服务型制造企业 进入工程领域条件

经过广泛调研，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铁装备集团总工程师王杜娟向“两会”提交了两个议案，目光聚焦于规范轨道交通重大装备行业和放宽服务型制造企业进入工程领域条件。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地下空间开发建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而拥有强大的高端装备研发制造能力和安全高效的施工工艺是重要一环。近年来，王杜娟始终专注于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地下工程装备综合服务，围绕政策支持、体制机制、技术研发、人才引进、标准规范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2014年5月10日，“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重要指示，指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也为中铁装备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沿着重要指示方向不断创新，牢牢掌握了隧道掘进机话语权，产品销往新加坡、意大利、法国、丹麦、澳大利亚等23个国家和地区，连续9年产销量世界第一。十余年来，中铁装备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每年的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7%以上，并持续扩大高端人才引进，加强创新管理体系建设，成功研制了世界首台马蹄形盾构、世界最大直径硬岩TBM、世界最大直径矩形盾构机等一大批开创性、奠基性产品。”王杜娟语气稍显严肃继续说，“虽然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研制了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产品，但仍有许多难题亟须解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王杜娟讲道，“中铁装备始终将创新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大力开展联合创新，深耕盾构机‘卡脖子’零部件和技术，在主轴承、减速机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无序竞争现象严重制约了国产高端装备的自主创新步伐，更影响了国产高端装备世界品牌的美誉。”

“目前，我国地铁隧道管片规格高达十余种规格，大直径盾构也有近十种规格，由于隧道设计时管片规格的不统一，管片模具、盾构/TBM不能通用，重复的研发投入的问题愈加严重，同时也严重影响了

设备的周转使用率。如果在同类工程建设中设定隧道管片规格系列标准，可以有效避免多方资源的浪费。”王杜娟指出，“因此，我在今年的议案中就加强对轨道交通高端装备行业的监督管理和规范隧道管片规格提出建议，这也是与国家供给侧改革精神相符合的。”

谈到第二个议案，王杜娟说，《中国制造2025》给出了我国制造强国建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的总体导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找准我国人力发展服务型制造的着力点，加快制造业从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是必然趋势。因此，围绕提供“制造+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重构价值链和商业模式的全新产品经营方式，针对放宽服务型制造企业进入工程领域准入条件，提交了第二个议案。

产业转型升级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中铁装备以“三个转变”为指引，坚定不移地推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科改示范行动、对标世界一流等落实落地。“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我们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向服务型制造业升级，在打造高端装备产品的同时，也为客户量身定制一揽子优质服务。”王杜娟详细解释到，“在以设备施工为工程主体的领域，定制化大型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结合工程设计推动工程施工和产品的技术创新，可以为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具备总承包服务的先天优势。如果制造企业能够进行总承包，可以通过不断的工程实践带动创造更多的创新产品，也更加有利于更多的新产品更快地投入市场之中。要进一步破除制造业企业进入服务业领域的隐性壁垒，持续放宽市场准入，支持装备企业取得工程和设备总承包资质，为制造业向制造业服务业转型提供助力，全面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健全的政策法规、完善的体制机制和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是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有力支撑，也是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王杜娟表示，“中铁装备将始终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加强技术研发，加快标准制定，加速转型升级，进一步推动地下工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全国政协委员姜洋：促进投资端改革 建设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中心

作者 程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今年带来了两份提案。在《关于促进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的提案》中，他建议有关部委深入研究发达市场的做法和经验，结合中国法制体系，完善财富管理相关制度，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研究制定统一的投资顾问法律或行政法规，推动资产管理业务统一监管。

姜洋指出，资本市场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日趋完善，直接融资比重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取得显著成效。注重融资端建设的同时，需要加快推进投资端改革，壮大理性成熟的中长期投资力量，不断拓展市场深度、增强反脆弱性。财富管理是支持资本市场实现投资功能的重要业务。随着我国居民财富快速增长，居民优化资产配置、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需求日益迫切。建议有关部委深入研究发达市场的做法和经验，结合中国法制体系，完善财富管理相关制度，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投资端改革。建议研究制定统一的投资顾问法律或行政法规。投资顾问制度是推动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的重要载体。据了解，美国以《1940年投资顾问法》为基础，建立了权责明确的投资顾问制度，任何符合法定要素的个人或机构都会被认定为投资顾问，除非符合豁免注册条件，均须依法向SEC或州证券监管机构申请成为注册投资顾问。通

过为客户选择金融产品、提供综合服务，将各类金融产品供应商和拥有账户系统及交易通道的经纪商紧密串联，成为行业发展的主导力量。现阶段我国投资咨询业务经营模式受法律严格限制，投资顾问服务供给滞后，建议借鉴美国关于投资顾问制度的立法实践，研究出台适合国情的统一的投资顾问法律或行政法规。

同时，推动资产管理业务统一监管。2020年实施的新《证券法》明确了资产管理产品的证券性质。目前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都在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建议国务院指导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在兼顾不同资产管理机构经营特色的前提下，出台资产管理业务的统一监管规则。

在另一份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屠光耀联合署名的提案中，他们建议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抓住机遇，建设高层次的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中心。

提案表示，中办、国办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提出，培育发展能源商品交易平台，支持上海期货交易等所等单位充分发挥作用，进一步健全交易机制、完善交易规则、严格监管标准。上海“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提出，增强“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支持“上海油”等基准价格在国际金融市场广泛使用。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建设面临历史机遇。加快

商品期货市场建设，推进对外开放，推动国际主体积极参与，将有利于把我国的贸易优势转化为商品期货市场的定价影响力，促进国际定价中心的形成。建议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抓住机遇，建设高层次的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中心。

一是大力发展商品期货期权市场。持续扩大品种供给，扎根产业需求，推动农产品、金属、化工、钢铁等领域产品扩面。积极推进行业市场化改革，支持成品油、天然气、电力期货上市交易，进一步完善能源产业链金融衍生品体系，提高我国油气企业整体抗风险能力，提升我国能源市场定价影响力。

二是加强期现市场结合，丰富机构投资者类型。实践证明，上海原油期货价格已经具备了作为基准价的基本条件。建议支持拓展境内商品期货价格使用场景，提升价格影响力，将上期能源原油期货价格纳入成品油调价机制，规范发展场外衍生品市场。加快推动银行保险资金入市和原油期货ETF上市。

三是有序推进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扩大期货特定品种范围，推广境内交易所境外结算授权业务，拓展“中国价格”的国际影响力。明确OPI、ROPI投资商品期货、期权产品的品种范围。完善期货市场对外开放配套政策，优化境外投资者参与内地期货市场的税收、外汇等政策安排。■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